



甘肃出土汉代陶盆口沿戳印“雕阴”铭文。

一尊鼎，窥见一座城

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内，一件青铜器“雕阴鼎”首次展出。这件战国时期的食器，不仅以其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设计吸引着

观众的目光，更因铭刻有“雕阴”二字引出那场决定秦魏两国命运的“雕阴之战”，以及那座在历史长河中若隐若现的“雕阴城”。

雕阴之战



“雕阴”铭文位置。

雕阴鼎，这件在1990年前后征集于延安黄陵县的珍贵文物，通高17厘米、口径15.1厘米，其上有盖，盖上有半环钮。这件器物的敛口、长方形附耳、微外撇的鼓腹和蹄形足，无不展现

出秦汉时期青铜器的典型风格。而耳侧的“雕阴”二字，更是为观众揭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回到那个战国纷争的年代。
据洛川民俗博物馆原馆长段双印研究员多年研究发现，该鼎与历史上著名的“雕阴之战”发生地有着密切的联系。据悉，雕阴之战从公元前333年开始，到前328年，历时6年，前后大战多次，秦国才夺取雕阴城。
段双印表示，魏秦两国隔黄河相望，山水相连，又都先后进行过变法改革，是战国七雄中的两个强国。魏国先是与秦争夺少梁（今韩城一带）一线澄城、合阳、大荔等地。魏武侯即位以后，秦魏反复争夺黄河西岸北部地区，战事频繁。魏惠王

时期，始筑西界长城拒秦，并筑雕阴城，以此为魏之上郡（今陕北一带）重镇。雕阴之战不仅重塑了当时的政治版图，也使得雕阴城的名字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随着考古学的深入，这座古城的面纱逐渐被揭开。
雕阴之战，是决定秦魏两国命运的大战，秦国在此战中斩获全胜，魏国失去了上郡等地，“先纳河西之地予秦，后献上郡十五城”。秦国则因此掌握了黄河天险。该战彻底改变了秦魏两国的攻守格局，为后来东扩北进，把今陕北全境收入秦国版图，对陕北的行政建置、历史进程发生了深刻影响，是甘泉乃至陕北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
段双印认为，雕阴故城可能在甘泉县的道镇与富县的皇甫店之交一带。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展出的这件雕阴铜鼎，其出土地点可能曾是魏国在河西地区的军事要塞或重要城镇。雕阴铜鼎上的铭文“雕阴”二字可证，直至汉代雕阴辖有今延安南部甘泉、富县、洛川、黄陵四县的大概范围。

雕阴遗存

雕阴城历史悠久，以往仅在文献中有所记载，一在今延安富县茶坊镇李家川，一在今延安甘泉境内史家湾，一在甘泉县道镇村附近。唐《括地志》载：“雕阴故县，在鄜州洛交县北三十里，雕阴故城是也。”清《延安府志》载：“雕阴故城，在甘泉县南三十五里。”那么，到底哪里才是雕阴所在？得益于考古学的有力证明，逐渐让这座古城清晰了起来。
早年，在延安富县伏龙寨的王家崓岭出土了刻有“雕阴”字样的陶器，该陶器证实了雕阴县在汉代的文化影响力和地域范围。而在富县牛武镇也出土了带有相同字样的陶器残片。
1981年，在延安富县皇甫店村出土了一方“唐和运墓志”，该墓志记载了和运夫妇“合葬于雕阴之左原”的表述，表明皇甫店村附近可能与古代雕阴县有密切的联系，进一步印证了文献记载的准确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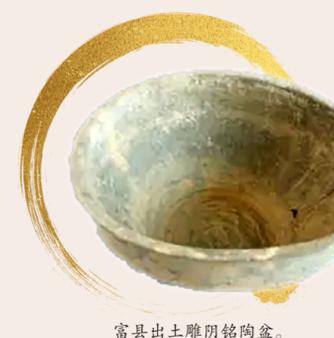
到了2008年，在延安甘泉道镇寺沟河村洛河东岸，有处川道突出台地引起了文物调查队的注意，观察发现该台地东西宽约300米、南北长约400米，这里地势宽敞平坦，倚山傍河，易守难攻，是一处难得的建城佳地。经踏查后果然在上面发现了散落着秦汉时期的绳纹瓦片、卷云纹瓦当等遗物。经专家组认定后，这是一处跨越新石器时代、战国、秦汉时期的历史文化遗址，该遗址就是后来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寺疙瘩遗址”。
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岳建回忆，当时在该台地上除了看到较多秦汉明显特征的陶片外，在靠近道镇村的断面上还暴露出一段直径30厘米的灰陶排水管。种种迹象表明，这里曾经是一片城池建筑遗址。岳建认为：“该台地上可能有大型建筑基址存在，应是雕阴城遗址在寺沟河的另一考古学证据。”
甘泉县博物馆展板显示：“雕阴故



唐开元二十年“和运墓志”。

城应以甘泉道镇城址为中心，与附近的史家湾古城互为犄角，构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雕阴何在



富县出土雕阴铭陶盆。

除了出土的雕阴铜鼎、雕阴铭汉代陶盆、唐和运墓志这些文物证据，魏长城的分布区域也为雕阴城的所在提供了证明。
在岁月的长河中，陕西境内的长城遗存主要有中东部战国魏长城和陕北战国秦长城以及明长城。其中，魏长城遗址韩城段、大荔段和华阴段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宜君和黄陵段的魏长城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魏长城作为战国时期魏国为防御秦国侵袭而修建的军事防御工程，其遗址在陕西境内渭南市的华阴、大荔、澄城、合阳、韩城和铜川市的宜君及延安

市的黄陵、富县等地被发现。现存墙体长度共约145千米，无不展现着千年以前，魏国和秦国之间紧张的军事战略关系。
10余年来，段双印关注“雕阴之战”和与此相关的魏国长城遗址，他认为魏长城的修建是魏国在军事上对秦国的一种回应。雕阴之战以后，在秦国的强大攻势下，魏国一败涂地，公元前328年，又将上郡15县全部割划秦国。从此，陕北全境除河套南之新秦中之地外，几乎全部划入秦国版图，并为以后秦长城、秦直道的修建，创造了前提条件。
考古发现，魏长城的修筑和布局也体现了魏国根据各个时期军事防御的需要，在不同区域、分地段、分时间、多次修筑的军事智慧。除了墙体本身，魏国在一些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如在长城附近建有军事性质的城堡，甘泉富县交界处的“雕阴城”和华阴的“阴晋城”、大荔的“洛阴城”、韩城的“少梁城”都属于此类遗存，目前有多处多段魏长城遗留的夯土墙体。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展区内，有与雍城、栎阳、咸阳、长安有关的考古成果陈列，其中就有栎阳城展区。栎阳城作为秦国的要塞见证了秦人从弱转强的辉煌历程，发生在栎阳城中的“商鞅



雕阴鼎。

长杨宫行灯

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开馆时，有一件来自西汉皇家长杨宫的铜行灯。其首次亮相不仅牵出鲜为人知的长杨宫，还为观众揭开了西汉宫廷生活的神秘面纱，让观众得以窥见西汉宣帝时期的历史光影。



长杨宫铜行灯。

西汉灯具种类繁多，常见的有形态优雅的豆形灯、造型独特的雁足灯、华丽而实用的连枝灯、可悬挂的吊灯、简洁的筒灯、以动物形象为设计灵感的兽形灯以及其他形式多样的陶灯。那么，秦汉馆这件首次展出的铜行灯的用途是什么呢？

据悉，这件铜行灯不仅是一件实用的照明设备，还因其身上的铭文而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考古价值。陕西省文物局原鉴定组研究员刘合心对该灯铭文“长杨宫铜行灯一，重一斤十三两，神爵二年造”进行了识读。

刘合心介绍，该灯自铭“行灯”，顾名思义，即黑暗中行走时用的照明灯具。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主编的《中国青铜器》，将这种器形描述为“一般有铭文自称‘行灯’或‘行烛灯’，多用于夜间引导行走”。

从铭文来看，这件铜行灯是在西汉宣帝神爵二年铸造，它属于长杨宫一件工艺精细的铜制照明工具，其重量为一斤十三两。特别是“神爵”二字，将该灯指向西汉宣帝刘询，该年号使用于公元前61年至公元前57年。

汉宣帝作为西汉中期一位有作为的皇帝，在位期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汉朝国力得到恢复和发展，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宣帝中兴”。汉宣帝杜陵位于今西安市雁塔区三兆村，作为西汉重要帝陵之一，已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该灯的造型来看，长柄略有弧度，平口、三足。区别于其他平稳放置的“摆件”灯，它可以通过长柄端着行走照明使用，是一件实用的照明工具。这件铜行灯设计精巧，造型别致，其表面可能经过精细的打磨，展现出汉代工匠们卓越的技艺。铜行灯的发现，为观众揭开了西汉长杨宫生活的一角。

长杨宫何在

该灯来自长杨宫，那么长杨宫在哪儿呢？考古学家指出，该宫位于今西安市周至县终南镇竹园头村，这里不仅是西汉时期皇家的游猎场所，更是见证了秦汉辉煌文明的重要遗迹。

《三辅黄图》记载长杨宫为秦旧宫，汉代继续使用。《汉书·地理志》注解中提到周至县有长杨宫，由秦昭王建立。《小校经阁金文》记载有长杨宫鼎，表明曾是在长杨宫中出土的器物。

而长杨宫之所以闻名，还与汉武帝的游猎活动密切相关。汉武帝曾多次到长杨宫游猎，有一次遭遇了大熊的袭击。在危急关头，随行的妃子从武士手中夺过弓箭，射死了大熊，救了汉武帝。为了嘉奖这位妃子的救驾之功，汉武帝在长杨宫修建了“射熊馆”。

不光是汉武帝喜欢这里，长杨宫作为重要游猎场所，从汉成帝时期的一次事件中也可可见一斑。汉成帝在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曾下令调集民众，在长杨宫大肆围捕野兽，导致当年秋收无法进行。

然而，这种过度的游猎活动也引起了一些文人的不安。西汉末年的文学家和哲学家扬雄（扬雄）以讽谏形式写了一篇《长杨赋》，表达了对当时皇家游猎活动过度的担忧和批评。

扬雄（扬雄）说：“虽然，亦颇扰于农人。三旬有余，其廩至矣，而功不图。恐不识者外之则以为娱乐之游，内之则不以为干豆之事，岂为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为神，澹泊为德，今乐远出以露威灵，数摇动以罢车甲，非人主之急务也。蒙窃惑焉。”

长杨宫遗迹

据悉，对长杨宫遗址的调查始于1980年的文物普查，淳化县文化馆的姚生民、周至县楼观台文管所的李宗华对其进行了初步调查。特别是在竹园头村的考古工作中，他们采集到了一批汉代的珍贵文物。这次调查标志着对长杨宫遗址系统性考古工作的开始，为了解其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奠定了重要基础。

随后，在1982年刘合心、周至县文化馆的马伯乐对遗址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踏查。他们不仅确定了长杨宫的确切位置，还详细测量了遗址的面积，发现遗址面积约为2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的厚度在0.5至1.5米之间。在这次调查中，除了汉代的文物还发现和征集到不少秦代文物。

在对长杨宫遗址的调查中，刘合心在一批精美汉代砖瓦文物中发现的“禁圃”文字瓦当比较罕见，对长杨宫的定性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佐证。

《说文解字》中，“圃”的解释是“种菜曰圃”，强调其作为种植蔬菜园地的基本功能；《周礼》等古文献中，“圃”指代种植树木和果树的地方。刘合心表示，长杨宫“禁圃”文字瓦当，作为极少见的瓦当，“禁圃”可能指的是一个针对百姓禁止入内的园林，或者是一个具有特殊用途或地位的园圃。

此外，刘合心发现长杨宫遗址出土的四神瓦当，特别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纹饰的瓦当，在造型、构图、视角上与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的四神瓦当有较大不同，显示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价值。

长杨宫遗址发现的秦代夔龙纹空心砖，青灰色陶质，夔龙身体呈横“S”形，线条流畅。还有夔龙树叶几何纹空心砖，砖面残存多种图案。汉代文物包括曲尺形虎纹砖，生动地刻画了老虎的神态。还有“官”字朱雀纹瓦当，瓦色浅灰，涂有赭红色，上有朱雀图案。

在长杨宫遗址中，还发现有其他类型的瓦当，如四叶纹瓦当、葵纹瓦当、连云纹瓦当等，以及羊角形双云纹瓦当、轮云纹瓦当等。另外，也有带文字的瓦当，如“汉并天下”瓦当、“与天母极”瓦当、“长乐未央”瓦当、“克乐未央”瓦当等。还有玄武纹瓦当、玄武云纹瓦当、虎纹瓦当、云纹瓦当、鹤云纹瓦当等也是出土文物的一部分。

时光荏苒，千年前的长杨宫遗址在历史的长河中静默地诉说着过往。当观众踏足这片古老遗址，那昔日的宫殿楼阁、繁花似锦只能在想象中重现。



长杨宫铜行灯铭文位置。



长杨宫遗址出土“官”字纹瓦当。

本版稿件由马凤霞采写